



毛澤東的心理分析

白魯恂 Lucian W. Pye 著

劉憲閣譯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李鍾

九思文存

毛澤東的心理分析

丘魯恂 Lucian W. Pye \著
劉憲閣 \譯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9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Mao Zedong
By Lucian W. Pye
Tim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Limited Co.,Lt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April, 2009

版權所有 翻版必究



九思文存

九思文化

毛澤東的心理分析

着 者：Lucian W. Pye

譯 者：劉憲閣

出版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九龍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22字樓

電子郵箱：times_hk@126.com

香港發行者：香港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荃灣工業中心16樓1609室

臺灣發行者：臺灣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出版日期：200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價：HK\$98.00/NT\$400.00

ISBN：978-988-17927-9-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我公司調換

*本書觀點不代表本公司意見

Tim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Ltd.

Does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viewpoints in this book.

致 谢

谨以崇敬、感激和爱戴之心
将本书献给
加布雷尔·A·阿尔蒙德

中文版序

隨着時間的流逝，我們現在對毛主席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有了一個更加清晰的印象；同時，也使我們對毛澤東人格特徵的分析變得比以前更加容易些。在開始進行有關毛澤東人格特徵的研究時，我是以一個受過訓練的精神病學者（psychiatrist）的身份，來看待和分析當時收集到的各種相關資料的。起初，這些資料提供的證據向我們揭示，毛澤東的個性特徵中存在着某種特定形式的心理並發症（a particular set of syndromes）。心理學的有關理論假設也告訴我們，還應該存在其他某些行爲特徵。現在，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告訴讀者：進一步的考察證明，在收集到的資料中確實可以發現某些根據前述有關心理學理論的假設應該存在、而實際上也的確存在的情形。儘管如此，我也很清楚，在嘗試對近乎神化的毛澤東進行一些心理學的分析與解釋時，自己一直在冒險，可以說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我相信，如果自己在分析中運用任何來自精神病學的專業術語，那都將是一種不謹慎的行爲；確實，這樣做還可能會適得其反，引起不當效果。有鑑于此，我從未公開宣稱，毛澤東是一個可能帶有某種邊際性人格特徵的自戀主義者（a narcissist with a borderline personality）——儘管體現出這兩種心理特徵之結合的人並不少見。我擔心，如果聲稱毛澤東正是一個體現了自戀主義和邊際性人格兩種心理特徵之結合的人，那麼，一些人將會因此而暴跳如雷，義憤填膺。

儘管如此，對毛澤東影響現代中國以及在此過程中透露出的人格特徵等有關歷史，學者們現在越來越傾向于持比較客觀的看法。這種情形的出現，就使我們可能公開運用心理學上有關自戀感和邊際性人

格綜合症（narcissism and the borderline syndrome）的觀點，來分析毛澤東的行為。所謂自戀感，通常可以被理解為某種對自我的、夸大了的愛。對此，學術界沒有多少爭議。而邊際性人格特徵，可能需要稍加解釋。通俗些說，這種人格的特徵就是：對控制、駕馭和利用他人有着強烈的慾望；同時，總能對自己的情感保持警惕，且對究竟是誰控制誰這一問題有着清醒的認識。具有邊際性人格特徵的人，不但無法發展任何重要的人際關係紐帶（或者說對某人的依戀感），而且還對受到忽視與怠慢有着較為敏感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他寧願隨時準備拋棄其他人，而不是相反，即冒着被其他人拋棄的風險。具有這種心理特徵的人覺得，自己是特別的，與衆不同的。換言之，自己是一個道德高尚、對社會有用的人，但卻未得到恰當的理解與尊重。這樣一來，任何特別接近自己的人，就可能立即變成對手或者敵人。看起來有些矛盾的是，體現出邊際性人格特徵的人一般臉皮較薄，對批評高度敏感，且很容易感覺到自己是否受到忽視；但另一方面，令人驚奇的是，對其他人實際上究竟如何解讀自己，他似乎漠不關心，無動于衷。具有這一性格特徵的人，其生活中心通常會圍繞着一系列的敵手。結果，他的身上就會體現出兩種同時存在的感情：一方面是個受難者，遭到其他人的欺騙和傷害；但另一方面，則是勇敢地面對和挑戰其他人，永不妥協，並由此生發出某種愉悅感。正如毛澤東的例子所證明的，這種性格特徵還經常會與某種強烈的次屬自戀感（secondary narcissism）聯繫在一起。因此，就會產生某種難以滿足的慾望，渴求成為他人的關注中心，並追尋他人的奉承、讚美與崇拜。尤有進者，這兩種心理特徵的結合造就了一個對情感重要性非常敏感的人；特別是，他對短暫的、積極的感情究竟可能會是怎樣的，也非常敏感。他使自己確信，其他人只會假裝對自己表現出熱情，但實際上，他們根本就不關心自己。明乎此，就明白了毛澤東當年為什麼會對共產黨人和年輕一代中國人的革命激情產生懷疑。

有關理論認為，邊際性人格特徵和自戀感發端於一個人的溫暖舒適、安全穩定、得到了充分關愛的嬰幼兒時期。在這段時期，雖然他甚至處於完全的依賴狀態，但是，他的每一次哭喊都會完全地控制、

駕馭他所在的整個世界。這樣一來，他就生活在某種既是無能爲力、同時又是無所不能的幸福狀態中（bliss state of both impotence and omnipotence）。在此狀態中，他似乎僅僅通過發出聲音，就能駕馭和控制整個世界。但隨後他就慢慢發現，自我與他人之間是相互分離、各不相干的。他還發現，就整個宇宙而言，自己實際上並不具有什么神奇的操控魔力。這是一種苦痛的感覺，這種感覺還非常強烈。因爲，它涉及到被那個恰恰是自己依戀的、且與自己關係最密切的人拋棄的那種感情。自此以後，在他的心里就會有一種強烈的渴望，試圖重溫那段美好的幸福時光；但與此同時，還會有一種深刻的恐懼，擔心再度形成對某些人的深刻依戀心理。

在毛澤東的整個領袖生涯中，有關拋棄感的主題反復出現。特別是當他開始反對自己選定的接班人時，就更是如此。與此同時，他需要重新確認自己的高尚情操與可能價值。方法就是，勇敢面對當時國家政治經濟情境中任何處于主導性力量的一方，奮起反抗，向他們發出挑戰。這個被挑戰的對象，一度是美國，後來是蘇聯。儘管如此，在發出挑戰時，毛澤東也渴望得到對手們的尊重。在特定時期，他需要反對那個適時的敵手；但是，他也需要敵手承認和尊重他的價值。

當我們通過心理學提供的有關準則來重溫毛主席的人生經歷時，他的行動中體現出來的那種人性化的品質，就是可以理解的。由此而出現的各種行爲模式，就解釋了他的成功與優勢；當然，與此同時，也說明了他的困難與問題。

白魯恂 (Lucian W. Pye)
2003年5月

前 言

閱讀本書前，先給大家提個醒。對從心理學角度來解釋歷史人物，一些人會表示反感。有關這一點，存在這樣一個基礎牢固的科學事實，它就像衛生部長作的警告性聲明（Surgeon General's Warning）那樣可以令人信服。事實就是，對這樣一種觀念，即兒童時期的經歷可能會影響他們成年之後的行為，有些人會感到不安；確實，他們甚至會為此而震怒。特別是當我們聲稱，甚至對那些歷史偉人而言，可能也同樣如此，即童年經歷會影響他們成年以後的行為方式時，一些人會為此而惱怒不已，義憤填膺。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認為自己傾向于對心理學的解釋表示疑慮，那麼，他就應該停止下來，不再繼續閱讀下去。

那些願意繼續深入閱讀的人，完全有權利追問：對運用心理學的洞見來研究政治領導人，我的看法是什么？在最近幾年中，人們對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這個全新的研究領域，產生了一定的興趣。我曾受到艾黎克森（Erik H. Erikson）的深刻影響。但在我智識觀念發展的早期階段，我也從其他一些先驅者們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這些先驅者曾努力將有關潛意識（the unconscious）的理解，運用到公共事務的研究中來。作為一個政治科學研究者，我深深地受惠于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加布雷爾·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內森·雷茨（Nathan Leites）的著作；同時，我也為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阿諾德·羅格（Arnold Rogow），羅伯特·雷恩（Robert Lane）和詹姆斯·戴維·巴伯爾（James David Barber）的研究所鼓舞。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我要感激以下這

些學者：亞伯拉·卡丁納（Abram Kardiner），拉爾夫·林頓（Ralph Linton），克萊德·克萊克霍恩（Clyde Kluckhohn），亞歷山大·英格爾斯（Alexander Inkeles），魯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喬夫雷·戈爾（Geoffrey Gorer），以及其他一些學者。因此，我傾向于認同自己作為一個政治學家的身份。我沒有表示自己要嚴守一個新的學科；因為對那些從事着最初由弗洛伊德（Freud）開闢的研究園地中的不同領域的學者們而言，這樣做是不公平的。

毫無疑問，對一個力圖避免陷入心理學這片沼澤的政治學者而言，在許多情形中應該保持警惕。但對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而言，卻沒有必要如此謹小慎微。因為，在這個領域中存在着某種廣泛的共識：有一個人的性格特徵完全地主導、操控與統治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發展。這個性格特質具有如此影響的人，就是毛澤東。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幾乎沒有人曾經嘗試着去系統地分析這種最顯著的個性特徵。當然，人們已經作了大量的努力來研究毛澤東的論著作品，並嘗試把它們放在中國智識觀念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背景中去考察。儘管如此，對毛澤東個性特徵的研究，卻只有兩種原初的、還處于胚胎階段的理論假設。一種看法是，把他描述成一個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一個有着充滿戲劇化色彩的性格特徵的人物；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他對死亡和不朽非常敏感。但是，卻沒有一種理論假設試圖尋求把這些特徵與毛澤東的情感發展歷程（emotional development）聯繫起來。

在處理有關作為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情況方面，傳記作家們猶豫不決。這就意味着，我們被剝奪了把他當作一個我們熟悉的、完整的人來加以理解的機會——譬如，就像對待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威爾遜（Woodrow Wilson）、路德（Martin Luther）、甘地（Gandhi），以及其他一些偉人那樣。當然，像所有的個人一樣，偉人確實也應該享有隱私權。儘管如此，也有一些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學者有責任盡力理解公共人物的人性化特點，甚至他們較為私密的一面。例如，有關動機的重要性。我們知道，個人動機總是影響其公共行為的一個因素。有些領導人的性格力

量非常強大，並涉及創造和調動強烈的集體情感——就像在對中國人呼籲民族主義和提倡社會變革的熱情時，毛澤東所作的那樣。對這樣一個領導人來說，探詢他怎樣理解人類的感情，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激情，以便能夠如此有效地影響其他人的情感，就是合理合法的；而且，也確實是必要的。

對心理學解釋的憂慮，大體呈現出兩種相互矛盾的形式。一方面，是“太多的東西被解釋”——這種充滿濃厚決定論色彩的分析暗示，在個體生命的後期生涯中，如此衆多的東西可以從如此細微的早期經歷中找到其淵源；但另一方面，則是“太少的東西被解釋”——畢竟，有許多人存在着類似的個人經歷，卻沒有引起同樣的公共效果。將這兩種反對意見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第三種說法：“基于太少的證據，造就太多的東西。”儘管如此，心理學解釋的原則不應與在分析人類行爲時的慣常要求有任何不同。真正的問題在於，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我們通常能夠處理一些“必要”條件；但就目前的知識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幾乎無法處理那些可以解釋事情為什麼會發生的“充分”條件。所以，心理學解釋遇到的問題，和其他某些學科的研究者們遇到的問題，基本上是一樣的——譬如，和某些智識觀念史家遇到的情況，就很類似。在考察毛澤東的認識發展歷程時，智識觀念史家們可以確認毛澤東曾經讀過的特定文獻和論著。據稱，這些文獻和論著曾經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影響過毛澤東的智識思想發展。儘管如此，智識觀念史家卻無法解釋，為什麼無數讀過同樣著作的其他人卻沒有受到類似的影響。心理學解釋面臨的問題，與這種情形類似；唯一的區別在於：一些人預期，可以有較多的東西被言說；另一些人則希望，能被言說的是較少的東西。

和試圖理解中國的許多研究一樣，有關毛澤東個性特徵的考察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相關信息的稀缺。大約 40 年前，毛澤東曾在陝北的窑洞里向斯諾做過一次值得注意的自傳性敘述。但除此之外，對作為私人角色的毛澤東 (the private man)，我們仍缺乏了解。可以說，有關這方面的事實性消息，就和我們讀到的有關中國政治實際進程的作品一樣，微乎其微，少之又少。我們能做的，不過是盡力拼湊所有

可以獲得的信息碎片，然後尋求一個似乎與大多數信息相互吻合或者一致的解釋。本書將分別對作為公共人物的毛澤東（the public man）和作為私人角色的毛澤東進行嘗試性探討，而對與此相關的文獻資料的反復考察和細心辨析，將構成全書的基本結構。

在我所作的工作中，較為特別的是：首先將所有可以獲得的，從心理學角度而言與毛澤東個性特徵有着非常關鍵和重要關係的信息並列起來。這樣一來，我就整理了毛澤東和其他人提到的他與母親的關係；我還考察了他以後和其他女人的關係，以及他怎樣對待自己的妻子。我考察了作為“兒子”，毛澤東怎樣對待自己的父親；以及作為“父親”，他怎樣對待自己的子女。毛澤東和兄弟姐妹們的關係，則被放到他以後將會遇到的、同學關係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對其中任何一種關係的具體理解，都可能有助于我們對其他關係的理解。我們的目的，是對毛澤東的個性特徵進行解釋；就上述那些關鍵的關係而言，這個解釋將與它們提供的證據相一致。隨後，我們將作為私人角色的毛澤東的有關描述，和作為公共人物的毛澤東的有關記錄並列起來，並為尋求有關這個處於領袖地位的人物之理解作些更進一步的調整。

坦白說，這種分析方法意味着，我們會不時地假定和推測，某些事情必定發生了——即使我們還缺少客觀的證據。我們被引向某些有根據的推測。因為，有關個性特徵的理論傾向於認為：在所有的生活事件之中，存在着某種一致性；那些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出現的一些個性特徵，與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的某些特徵，彼此都有關聯。

在解釋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的心理時，這種途徑把我們引向一個新的重點和一系列新的關注。按照心理學的傳統理論，有關權威和反抗問題基本上是根據與父子關係有關的緊張和壓制來解釋的。但在毛澤東的例子中，我們發現：這種關鍵性的發展是與他的某種前厄狄普斯浦斯或者前戀母情結（pre-oedipal experience）的經歷有關的。而這，就涉及到毛澤東與他母親的關係，一種曾給予他強烈的自戀感情的關係；但當他再也不能繼續博得母親專一的關愛時，這種關係也給他帶來某種遭到不公平對待的感覺。我們的假設是，毛澤東的這些最初經歷最佳地解釋了他作為一個造反者，以及作為克理斯瑪型權威的

領袖角色（charismatic leader）。它也說明了，為什麼西方社會的激進青年從毛澤東身上找到那麼非同尋常的吸引力。和毛澤東一樣，這些年輕人也因類似的挫折感和憤怒感而需要反抗。之所以會有這種挫敗感和憤怒感，是由於這個世界並沒有滿足他們出生後，最初瞥見的對生活的種種期望。當時，正處於嬰幼兒時期的他們，正沉浸於因全能感和幸福感而帶來的、非同尋常的安全感和放縱感之中。

在本書即將開始時，必須強調我們所進行的分析之嘗試性質。但充滿希望的是，如果我們最終可以獲得更多的信息，那麼，修改或者進一步證實我們對毛澤東的有關解釋是可能的。同時，當中國政治體系正專注於繼承或者說接班人問題（question of succession）時，檢驗一下有關毛澤東偉大特性的心理學維度，就是一個特別合適的時機。毛澤東如何指導自己作為公共人物的生涯的最後一個重大問題？理解該問題的任何嘗試，都需要對毛澤東的整個人生經歷有一種發展性的觀點。更有甚者，儘管無法預知在毛澤東逝世之後將會發生什么事情，但非常可能的是，他的生活經歷很快就會被遮蓋在一幅較之此前更加厚重的神話帷幕中。毛澤東的大半生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但尚未最終凝固成永恆不變的神話故事；在此之前，他仍有最後一幕戲劇要上演。有鑑於此，對作為領袖的毛澤東進行這樣一個嘗試性的心理分析，就適逢其時，非常值得。

在從事這項研究時，我要感謝劉平鄰教授（Alan P. L. Liu）的鼎力相助。為盡力挖掘有關毛澤東一生經歷中的某些隱秘的事實，他曾經給我以廣泛的幫助。起初，我們曾打算聯合完成這項研究；但後來，麻薩諸塞和加利福尼亞之間無法克服的空間距離證明，合著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沒有經常的、穩定的接觸和交流，我就開始獨自寫作。我在自己對毛澤東個性特徵的解釋中游移不定，越漂越遠。而劉的著作，特別是那些涉及其他人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以及毛澤東與同事們關係的作品，是有關毛澤東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其獨到之處。本書第二章和第十章參考了這些研究。

我曾與史蒂夫·皮茲尼克（Steve Pieczenik, M. D.）進行過長期的、富有啟發性的討論。這些討論對我形成有關毛澤東的心理學解

釋，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他不斷地促使我去尋求有關個人行為的更深層次的解釋；他還把海倫·多伊奇（Helence Deutsch）和奧托·克恩博格（Otto Kernberg）的一些頗有幫助的書推薦給我。多羅茜·克勞斯·馮塔娜（Dorothy Grosse Fontana）則幫我收集了有關毛澤東與同事們關係的資料。

我也受惠于那些認真的、帶有批判眼光的讀者，他們曾從心理學、中國歷史、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以及本書寫作的行文風格等角度，考察過本書手稿。讓·麥克·波爾（Jean MacKenzie Pool）準確地領會了我有關毛澤東心理解釋的所有維度；出于高度的敏感，他還用更進一步的、精細的假設向我的解釋提出挑戰。哈羅德·艾薩克（Harold R. Isaacs）是研究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首屈一指的人物。帶着批判的眼光，他逐字逐句地審讀了書稿；這一行動，再次體現了學院派同事們嚴謹的學術理想。米歇爾·奧克森博格（Michel Oksenberg）慷慨地擠出時間，與我分享他有關毛澤東統治風格的知識財富。理查德·所羅門（Richard H. Solomon）則在中國人的心理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方面，給予我難以估量的幫助。勞爾·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憑藉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豐富知識來審視我的文章。在有關毛澤東的孩子們的許多事實性細節方面，愛德華·萊斯（Edward Rice）提供了幫助。我還要感謝以下讀者：加布雷爾·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蘇珊·博格（Suzanne Berger），戴維·德努恩（David Denoon），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蘇拉·波爾（Ithiel de Sola Pool），以及邁隆·維納（Myron Weiner）。

我要感謝西德尼·劉（Sidney Liu）對一些關鍵性問題的開掘和他的慷慨。

我很感謝維吉娜·彼爾特（Virginia Peltier）在辨認我模糊難認的手稿，以及打印似乎永無休止的修改稿時表現出來的耐心。

還有瑪麗·派伊（Mary W. Pye），她在潤色我的文章、挑戰我的推理，以及在編輯和校訂等每一個工作環節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果能與那些曾幫助過我的人一起分擔本書的榮譽，我會感到更加欣慰。當然，本書的所有缺陷和不足，仍由我自己負責。

目 錄

致 謝

中文版序	001
前 言	004

第一部分

導論：猴子與老虎

第一章 問題

——毛澤東的心理性格及政治得失	003
第二章 印象：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	016
第三章 印象：作爲公共人物的毛澤東	039
統一，還是矛盾？	044
冒險，還是理性？	049
直接的嚴密控制，還是間接的權威代表？	055
信任關係：人格化，還是非人格化？	058
政治風格：群衆路線，還是精英主義？	060
容忍批評，還是選擇衝突？	062

第二部分

作爲私人角色的毛澤東

第四章 家庭與母親	071
第五章 兄弟姐妹	090

第六章 父親	109
正義感	131
第七章 同學與老師	139
第八章 妻子與子女	172
被拋棄的包辦新娘	178
第一個妻子：楊開慧	181
第二個妻子：賀子珍	201
第三個妻子：江青	210
作為父親的毛澤東	212
代際的循環	218

第三部分 作為公共人物的毛澤東

第九章 政治創造性：技能問題	225
意識形態：言辭的魔力	229
情感鼓動家：製造敵對關係	232
利用矛盾：鬥爭的方式	241
從魅力型權威到實質性權力	244
行動：作為意志力的權力	250
第十章 政治拋棄感：恐懼問題	256
敵對情感和同志情誼	269
三個例外	288
第十一章 問題再思考	297
——毛澤東個性特徵及其政治活動的心理學分析	
索引	308
譯校後記	338

第一部分

導論：猴子與老虎

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爲主。也有些猴氣，是爲次。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